

676

676
732

人文学术论丛

主 编 贾怀勤

执行主编 荣 真

副 主 编 李景瑜

董 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学术论丛/贾怀勤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12

ISBN 7-81078-035-2

I. 人... II. 贾... III. 人文科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399 号

©2000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文学术论丛

贾怀勤 主编

责任编辑: 刘传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网址: <http://www.uibep.com>

山东省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15.625 印张 357 千字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78-035-2/G·010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23.00 元

民族精神与青年毛泽东的价值取向

罗德荣

(人文科学系 法学 硕士)

〔内容摘要〕 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民族精神犹如思想沃土，在与现实的交汇与冲突中，深刻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他对中国与世界、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的思索与实践。

〔关键词〕 爱国 群体 现实

所谓“民族精神”，一般是指一定的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体现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对本民族共同体社会存在的思维反映，是建立在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的一种维护民族生存和促进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他发生影响的，首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民族精神对钟爱国学的毛泽东来说，犹如思想的养料与沃土。这种厚重的积淀，在与现实的交汇和冲突中，在传统逐渐瓦解和动摇的年代里，依然深刻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取舍。

一、以爱国为轴心来运筹中国和世界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爱国传统的民族，爱国主义是中华儿女经过相当长时期培育并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毛泽东自幼酷爱读

书，仰慕拯救危难的民族英雄，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使他从小就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一种深沉的使命感，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促使他孜孜不倦，发愤攻读，极富个性地探求着扭转乾坤之道。

（一）爱我中华，放眼世界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五千年积累的文明，古人和近人颇多颂词。春秋时公子成便说：“中国者，聪明徇智之所居，万物财用之所聚，贤圣之所教，仁义之所施。”^②近人康有为说：“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圣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③所有这些，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也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骄傲。但自近代以来，对待中西文明开始出现两种偏激的态度：一种主张全盘西化，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只要是来自西方的东西就是完美无缺的，凡是带洋字招牌的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另一种是“国粹主义者”，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都是好的，而外来的东西都要不得。那么，青年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在近代中国的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呢？

第一，在他看来，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④作为国人，首先应当掌握国学。若不重视国学，必将导致“学绝道丧”。纵观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他对中国历史、经典古籍有着浓厚兴趣，《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都通读过；诸子散文、诗词曲赋、小说杂记等古典文学犹如古老的酒酿，常让

①④《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0页，474页，湖南出版社。

②《史记·赵世家》。

③《强学会序》。

他陶醉。这种酷爱，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兴趣，而是他对中华文明的特殊感情所使然。

第二，对祖国文明的自豪并没有妨碍他对西方文化的热烈追求。1912年秋、冬，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度过半年的自学生涯，通过阅读严译八种，他对西方文化开始有了大规模的了解，他以沉重的心情和严肃的态度认真检讨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传统文化狭隘的空间进入世界范围，眼界和胸怀大大开阔起来。他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数千年来，中国人只知有家族，不知有国家，只知有群体，不知有个人，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①一方面家庭稳定，家族相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另一方面，又闭塞保守，愚昧落后，排斥进化，泯灭自我，惰性十足，奴性尤甚，宿命思想泛滥，终日“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②只追求宗法关系中的“和谐”，不懂得国家关系中的竞争，这种状况，和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现代世界先进国家实成鲜明对比。这是中国文化不及西方文化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决定了人际之间只存在一种严格的服从关系，“服从”具有最高的价值，人们在服从中体会和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忘我的服从中，人生才能升华到最高的境界。由服从而达迷信，由迷信而丧失自我，由自我的丧失而造成彻底的奴性，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在毛泽东看来，“‘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③既然国家的要点在主权，主权的基础在民众，那么，国家主义的基础是充分发达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所要求的所强调的是人的天性本

①②③《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0页，294页，526页，湖南出版社。

性、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有无上的地位，国家为国民服务，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联。中西文化的对立，核心是价值观念的对立。因此，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中强调主体发展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建立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体系。文化选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苦难的中国找出一条摆脱苦海的道路。

第三，立足我民族文化，吸收有益的西方文化。毛泽东对中西文化，自觉地持一种冷静的分析态度。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就绝对的坏，西方文化就绝对的好，“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西方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②这种分析、批判的态度促使毛泽东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庇千山之林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为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③结合之道在于“先博后约，先中而后西”^④，先下工夫研究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国情，同时，“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而“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⑤。即是说，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有益的养料，为改造中国服务。他对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信心，“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惰性和落后的一面，乃是“独夫政治”的产物。他相信只要铲除专制主义的独夫政治，实现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那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638页，7页，474页，22页，394页，湖南出版社。

(二) 忧国之兴亡，虑全人类的解放

忧患情怀是爱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忧世、忧民、忧天下是古往今来一切爱国志士的共同意识，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深刻、持久、强烈。在民族忧患意识的熏陶下，毛泽东弃商从学，立志救国。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整合他以前的经验和知识，他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一定过得不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随着知识的增长，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争夺海外殖民地，是产生世界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要消除这一根源，就必须唤起全人类的觉醒，推翻帝国主义。循着这一思路，他响亮地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

192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根据这一思想，他进一步强调，“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揭示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是要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样，既从本质上区分了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界限，又从“感情是普遍的”这一个基点上，深刻地阐明了爱祖国与爱世界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履改造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而且“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①另一方面，“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5页，湖南出版社。

基”，他还进一步论证，“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在中国^①。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战略思想既指出了目标和途径的统一，又阐明了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为实践以上理想，他曾建议新民学会会员赴南洋从事教育工作和改造运动。1920年，他给南洋会员去信说：“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②可见他心系全球的博大胸怀，也说明毛泽东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思想，在更高的境界升华了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忧国忧民之情，以此为基点，他追求着非凡的人生价值。

二、以群体为依托奋自我之权威

群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它以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为主要特征。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③，“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④以群体利益为重，这是儒家提倡的理想人格。墨子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⑤法家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⑥如此可见，诸子百家尽管学派不同，但绝大多

①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0页，599页，湖南出版社。

③ 《论语·宪问》。

④ 《荀子·王制》。

⑤ 《墨子·兼爱中》。

⑥ 《慎子·威德》。

数是以追求群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后世的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精神。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李世民的“公治天下”，程颐的“仁者公也”，王夫之的“循天下之公”等等，都体现了群体精神。应当指出，传统的群体精神也包含有肯定正当个人利益的思想因素，但更主要地体现为对个性的压抑、约束和限制。

青年毛泽东首先受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对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作过认真研究，对古代伦理思想有全面的了解。尔后，他以追求真理的极大热忱，在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广泛涉猎和研究了古希腊、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伦理学说，对西方伦理发展史有较完整的了解，其中尤以卢梭、康德、尼采、格林对他的影响为著。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以“新时代的眼光”猛烈地批判了封建道德禁锢人性的一面，大量地吸收了西方伦理中重视个性、追求人道的思想，并对中西方伦理中的合理内核加以抉择，融合为一种进步的、高扬自我价值同时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的新观念，即：以人为本位，以实现自我为核心，由实现个人推及于实现社会全体，以人人人的“至善”而达到社会整体的“至善”，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完善互相包含。

（一）自我和社会

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身受重重压迫、由人异化为非人的时代。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这样：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受到极度践踏和贬低的时候，人对人自己的关心，人对人自己的命运与权利的探索和把握的欲望，就会表现得特别强烈。毛泽东自幼受母亲人道风范的影响，培养了一颗敏感的爱人之心。从长沙饥民暴动、韶山“吃大户”风潮中，从他父亲毫不留情地买进贫农田产等事件中，他隐约感受到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非人道的关系，由此萌发了要寻找答案，替受苦的大多数人伸

张正义的想法。走上求学之道后，他渐渐明白，这个社会本是人的社会，但它对于人却是如此冷漠无情。它不会过问农人的肚皮饱不饱？它不会过问工人的工值多少、工时长短？它不会过问学生何以这么呆板？它不会过问妇女为何受着无数的摧残和束缚？总之，它对“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不闻不问，相反，它强迫人养成以“服从”为全部准则的“奴隶的心理”。对如此残酷的社会，毛泽东充满了愤恨；对如此苦难的人们，他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以“自我”为切入点，对人性进行了新的诠释。

他认为，自古以来，天子以拥有天下者自居，家国同义，公私难辩，所谓“克己奉公”、“公天下”、“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中所包含的群体意识，皆以服从为特征，经过统治者的反复宣传和强化，成了天经地义的规定，要求人们不加思索地执行。这种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并不真正代表“公”与“群体”的利益，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准则，它强调个人的行为必须“待人而有”，服从道德便成了服从他人的意志，道德成为“成全他人”的需要。他提倡自主的道德，其一，道德并不存在于人们的相互关系之间，它只是个性完善的主观要求的表现，“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人的本性要求“自完”、“至善”，它和旁人及社会没有关系，“且即使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其二，道德不是什么神的命令，既然“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服从”，“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总之，实现自我具有最高价值，所谓“实现自我”有两方面含义，一曰“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二曰“发显自我”，即充分表现自我。而发达身心或发显自我必然导致与外界相冲突，与传统社会、与黑暗政治、与恶劣环境相抗击，那么，改造甚至摧毁它们便成了尽性完心的内在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人人都有独立

人格，有意志毅力，有强健体魄，能不顾一切无畏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社会何愁无望？如此这般，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在高扬个性的毛泽东潜意识里，依然难分难解，不可或缺。

（二）利己和利他

在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上，毛泽东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利他是利己的手段，利己是利他的目的，利他只是实现利己的要求，是为利己服务的。“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也，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又说“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之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说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人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而充分发展吾人之精神。”^① 即是说，没有利他，利己也不完善；唯其能够利他，利己才能实现；履行义务同样也是利己，因为义务也是人的自我实现和完善的内容，实行义务，有利于完善人的情感和精神，使人的自我完善向最高发展。他把利他作为利己不可取代的部分，又把利己归结为利己的精神发展，而不是个人对物质占有欲的满足；同时把义务包含在个人发展的本性要求之中，视对国家、社会、他人的义务为本性发展的神圣要求，这样履行义务便成了每个人的天职。他对那些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极端鄙视，他也极为鄙视那种囿于小家而觅衣寻食的小人。他曾经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要经常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在动员弟妹投身革命时，提出要“舍小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6页，湖南出版社。

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他认为真正的利己主义是真实的、博大的，它利自己，利人类，利宇宙，他把全人类的解放当作最为可循的人生目的，唯其如此才能利自己的精神。可见，这种包含着爱国爱民的利己主义已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它否定了个人至上、损人利己和唯利是图等西方伦理，他阐发的由义务而产生的利他行为，包括了劳动人民患难相助，“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为祖国、为主义和信仰、为亲人，“宁可使自己死”等美好内容，溶入了民族精神中“助人为乐”、“舍身成仁”等传统美德。也说明毛泽东已把救国救民的责任内化为主观的内在的义务和情感，只有完成这一义务，才能遂情达意，身心俱泰，实现自我。

三、以现实为基点追求理想人生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农耕生活使农民悟出了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于事无补，实心做事必有收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之风也感染了士人，“华而不实，耻也”；“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一贯奉行的准则。经过历史的淘洗、浸润，“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儒、墨、道、法诸家，经、史、文诸学，都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研究现实，为现实服务。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为反对宋明空疏的心性之学，高举经世大旗，以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魏源等为代表，他们提出了立身处世做人的基本原则。这种代代传承的经世作风，青年毛泽东极为推崇。他曾专门抄录了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撰的序文，作为自勉的“信条”。他写道：“昆山顾宁人先生，……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计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

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①由此可窥一斑，在务实精神的熏陶下，他提倡现实主义的人生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珍惜现在，执着现实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曾记下这样一段话：“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②人生是短暂易逝的，如果不珍惜现在，终将失去未来，因此不要在怀念过去和空想未来中耗误现在的努力，在时局危急、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种重“现在”、惜“目前”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还认为，“现实”，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现在”，而是指“吾人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之经历”，即人的全部生活。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我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确立和发达，它要求自我只对自己一生负责。“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而且，“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事实，所当尽力逐行”。就是说，现实环境中与我相联系的、客观合理的事情，就应当尽力去办，不可推诿。唯其如此，方能“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根据这一原则，青年毛泽东极为反对发思古之幽情的尊古观念和图未来之名利的虚务主义。他认为，“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之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借鉴历史为的是现实。开创未来，也是为了充实现实。如果不从现实看未来，而以未来裁剪现实，就必然本末倒置。他从切身体会中认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妨碍国人实现自我的恶魔，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就是现实的最大战斗任务，是眼光和精力必须集注的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9页，601页，湖南出版社。

目标。他表示要不顾个人得失、历史褒贬，努力去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之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知吾芳名，然而非之所喜悦，以其属于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是故，他对“思留名于千载者”或“欣羨他人留名者”^①都不以为然，认为，所谓“功业利后世”的想法，“决不可存在其人主观之中”，流芳百世只应是在现实中人格自完后自然引出的客观效果，决不能作为主体在现实中生存发展的动力。只有冲破名缰利锁，把一切外在因素都排除在行为动机之外，真正从义务感情出发，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青年毛泽东的这种立于现实的根基之上，不务虚名、责己自律的道德价值追求，有利于把人们从沽名钓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以务实的精神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厚古薄今、崇玄虚、立功名等等观念的反动，是“经世”传统的延续，是符合“五四”时代历史要求的。

（二）注重实践，追求理想

来自农村的毛泽东深知，“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故“为学之道，重在行事”。他提出讨论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②，若改造中国依靠头脑的“冥想”必然陷入错误，决不能脱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为此他曾以游学、调查、家访、办学等形式来深入社会。后来他在新民学会获得“实践家”的美称并非偶然。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实践，他曾提出了知——信——行的认识论公式。知指知识，它是行动的起点；信即信仰，指在理性知识统帅下的、有强烈的情感意志成分参与的全部精神活动，可以理解为理想；行是知达于信后的必然行动。这个公式虽然存在明显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9页，414页，湖南出版社。

的知先行后的唯心倾向，但它的优点是突出强调行动必须是理性指导的、自觉的、自动的，而唯有信仰和理想的确立，认识才能转化为自觉的实践。所以，人们一定要树立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①由于实践是有限的，理想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生没有终极理想。“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唯事能达到。”这里所说的“理想终不能达到”，不是指具体的理想目标不能达到，而是指理想既在现实之中，又超越于现实之外，人总是不断超越现在之我而创造理想之我。不断追求编织着理想人生。因此，人生在世，要重视在追求中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相信“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他还相信“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②从韶山——湘乡——长沙——北京的求学行程上，可以一窥他那决不止步的坚韧精神，从他安于淡泊、不图享受的苦励奋斗中，可以透视他奋不顾身的艰辛探索。尽管在他的成长旅途上，荆棘横生，挫折迭起，但也动摇不了他那热烈而执著的昂扬斗志和积极而恒久的理想追求。

如果说，人生观是世界观的核心，那么，价值观则是人生观的灵魂。它通过主体作出的价值选择制约主体的立场，从而影响其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走向。青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的思想远未成熟，其中包含着许多矛盾和局限，但思想的主流是，一方面，他力求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励志弃旧图新；另一方面，在对新文化的喝彩中，他始终洋溢着爱国、仁道、经世、忧民等民族精神。这种态势直接影响毛泽东的价值观架构，尽管他的世界观还在不断变化，但价值取向的初始模式导引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撞击里、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中，必将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页，156—162页，湖南出版社。

晚年毛泽东的“吏治”探索及评价

车洪波

(人文科学系 哲学 教授)

【内容摘要】 管好干部，管好党，以确保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和实践的中心。本文分析了毛泽东“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它的局限。联系现实，强调要建立民主法治的政体和高效廉洁的政府，必须走出“人治”的思维格局与实践操作。

【关键词】 吏治 人治 法治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国家是党的十五大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举措时，晚年毛泽东的“吏治”思想与实践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挖掘、整理；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需要我们反思、超越。

在毛泽东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如何管好干部、管好党一直是思考、探索的问题。在他艰难、顽强的探索中，有些东西至今不应被遗忘。

(一) 毛泽东对管好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超乎常人的敏感和预见

20世纪40年代，在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的最初实践中，毛泽东便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头脑超前思考这一历史难题。1944年他借《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告诫全党，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①。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他提出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是振聋发聩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务必使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敌人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进攻，克服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②，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起到了敲响警钟、防微杜渐的作用，在新中国诞生的初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个数千年来最廉洁勤政、最顺民意、最得民心的政权耸立在神州大地，这是连国内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50—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论战和分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发生的微妙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加之中国所处的极其复杂、险恶的国际环境，更加剧了毛泽东捍卫来之不易的政权的忧虑和焦灼。深谙战术的毛泽东坚信，四面处敌之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党内出了问题，那将出现“红旗落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悲惨情形。特定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使毛泽东晚年的吏治思想一直侧重于政权的捍卫上。他反复强调的是要保证各级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警惕党内出现资产阶级。他要求各级干部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要求他们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站稳立场，不搞修正主义，不能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他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

① 参见《毛泽东书信集》第242页注(2)。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6—1377页。